

唐代金银器折射出的历史信息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艺术代表作，如商周青铜器，汉代丝绸与漆器、唐代金银器和宋元瓷器等。考古学家林梅村曾认为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西方重金而中国重玉。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用玉，黄金和玉石甚至被视为以欧洲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重要区别之一。

20世纪，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等地，发掘出土了大量金银器，从出土的数量和面貌可以看到唐代金银器的发达工艺及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与外来文明交会的重要时期，当西方重金文化与中国重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碰撞时，唐代金银器折射出怎样的历史信息？中西文明分野中的重玉特质在中国历史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它们对于今天正处在东西方文化更大规模、更深层面交流碰撞中的中国，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以金银贵金属为原料的金银工艺，在我国早有记载。殷商时期已有金器，古时的《禹贡》把金、银、铜并列为金属三品。唐以前的金银器主要是各种装饰用品，唐代金银器多为日用器皿。以贵重奢华材料作为碗、盘、杯、壶、瓶、熏等的制作原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代社会上层贵族的奢华时尚，更显示出唐代雄厚的国力。

唐代金银器在金属质地的炫耀、器形纹饰的多样、制造工艺的雕琢中，都透出别样的气息。其中有的已在唐诗中为我们所熟悉，李白《对酒》一诗中曾吟咏“葡萄酒，金叵罗，吴妓十五细马驮”。岑参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曲相合，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犂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金叵罗与胡瓶，便透露着唐代对外来文明的包容。

唐代金银器结构的复杂性反映出来源的多样性。亦贡亦贾，是中世纪国际交往的一大特色。唐代金银器达到全面繁荣，与这种文明间的交会密不可分。外域贡奉，皇家赏赐，商贾贸易，长安贵族与入居异族的需求，使唐代金银器呈现出多种文化

并存的特质。从唐代金银工艺中可以追寻到西亚、中亚袄教艺术因子入华的痕迹，其中可以看到伊朗艺术的影响，也可观察到希腊风格、拜占庭风格、中亚风格、草原风格影响的痕迹，以及唐代工匠赋予其上的浓厚唐代风韵。

唐代金银器折射出世界文化在中古时期的交流与变化，显示出中华文明历史上接纳其他文明的包容态度。但是在中国美术史中，唐代金银器的地位，远不及宋元瓷器。最终，唐代的金银器无法在美学品质和精神内涵上达到与宋元瓷器相比肩的地位。

虽然唐代金银器体现了唐人品味与对异域文化的取舍，在内容上改变了初期接受粟特写的写实性动物纹，加入凤鸟、戴胜鸟、鸳鸯等中国祥瑞题材，在装饰风格上，改变了粟特锤揲凸瓣类银器分瓣多而细密的特点，创造出唐代艺术装饰瑰丽的花瓣式造型；在审美趣味上，改变了西方艺术特征，以水波纹在银杯内底加入动感意象；在造型结构中，打通粟特器物原型外壁与唐代屏风画结构间的同构关系，创造出狩猎图与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如同屏风一幅幅展开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唐代工匠在对金银器的构图经营、形象选择、装饰细节诸方面，努力体现出东方式的审美，也没有摆脱其在富丽华贵、金碧辉煌中散发着的异域情调。引人深思的是，唐代金银器虽然达到过全面繁荣，却因“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在晚唐时期走向衰落。除在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中保留着影响因素外，未能从美学角度对中国工艺美术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选择了瓷器。有着温润如玉品质与淡雅文人气质的瓷器，自宋元开始就承载着中国美学的内涵，在对外贸易中保持持久的魅力，成为与丝绸同样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使者”。由于体现了玉所包含的温润、柔美、润泽、坚韧的特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自然天成、文雅谦和的审美心理与理想，瓷器作为玉文化衍生出的中国艺术形式，更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唐代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时代特质，为唐代开一代诗风，强大的民族自信，将唐

诗推向中国文学史的至高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甚至成为一种经典。但同样是得到唐代时代精神的沐浴，为何唐诗中华丽、雄壮、清新的风格都能直接透射出唐人特有的气象，能为千古咏唱，而唐代金银器却只能在那个时代的长安盛行，作为贵胄商贾与域外人华各族圈内交流的物品？为什么一个重玉的文明国度，在唐代时其皇族可以视一切外族为我友的开明胸怀和对文明交流的需求，能够使金银工艺成为当时手工业中的一个突出部门，并在很长时间内大规模发展，却无法使金银成为中华文明美学追求的最终选择？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唐代社会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某种相似性，都处于中国与外来文明产生重大交融的时代。作为当时国际大都会的长安，对于各种宗教、各族人民同样包容，胡化之风盛极一时，西域所传的乐舞、画派、胡服诸种都能在长安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与自信心态，足以使当时的社会取精用宏，采撷外来之精华，主动选择自身的文化创造，开启中国文明的新面貌。

金银器的制作，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不能兼容，终被放弃。而诗歌、书法却承载了唐代中国全新的飞扬精神，焕发出神采。冯友兰先生十分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他认为某一文化，当其社会类型转变时，其文化的形式和花样是不必变或不能变的。这些形式和花样是一定民族由其种族、语言、历史传统所决定的，是这一民族最欣赏，也只有这一民族最能欣赏的。为此，冯先生分别文化之“质”与“文”，分别文化的民族性之“中国底”与“中国的”，以期革新“决定了文化的类型、时代性”的质，继往“决定了文化的个性、民族性”之文，以保留属于“中国底”。

在新的历史时代，当我们开始不停建设时，是否透过历史思考过未来的人们会怎样看待今天中国建筑、器物、艺术、文学中呈现的特征？思考过怎样的创造会既具当代文明水平，又独具中国文化品质，更透出深厚的中国美学气息？我们需要与自己的历史进行沟通，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距离去观看，在一个更宽广的整体中，更清楚地看见历史，在今天发现过去历史的意义所在。□

孙葛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唐代金银器折射出的历史信息

作者: [孙葛](#)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刊名: [美术观察](#) 
英文刊名: [ART OBSERVATION](#)
年, 卷(期): 2009, (6)
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msgc200906050.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3月23日